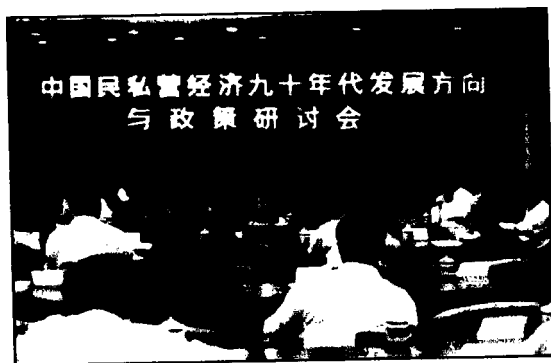


第一部 改革没有浪漫曲

(1989-1994)

推进市场取向改革
市场不相信眼泪
证券市场冲击波
破冰之旅
改革没有浪漫曲

推进市场取向改革



中华工商时报参与主办的“中国私营经济九十年代发展方向与政策研讨会”。15年来，时报坚持市场取向的新闻价值观，敢立潮头，敢立新言。

适度发展私人经济的政策不会变

——访国家工商行政管理局个体私营经济司司长王忠明

□ 晓 星

现在全国正在大张旗鼓地整顿个体工商业户和私营企业的税收秩序，同时，各主要的报刊都载文批评前一段有人提出的“私有化”主张。在以公有制经济为主体的新中国，几十年来私人经济命运多舛，它的复兴不过 10 年。如今它再度成为海内外舆论关注的对象。

近日，笔者就一些问题走访了国家工商行政管理局个体私营经济司司长王忠明高级经济师。

“适当发展私人经济有益国计民生”

王忠明首先介绍了中国私人经济发展的现状。到今年 6 月底 全国城乡已有个体工商户 1234 万多户 从业人员 1943 万多人 到去年底 全国有雇工 8 人以上的私营企业 22.5 千户。

王忠明回顾到 仅仅在 10 年前 中国还是单一的经济模式 全国只有 14 万多个体工商户 (主要是小商小贩) 而自 1956 年对生产资料的社会主义改造完成以后，私营企业就不复独立存在。

1979 年以后，国家采取了在公有制经济占主导地位的同时多种经济成分并存的方针，承认个体、私营经济是公有制经济的必要的和有益的补充。“忽如一夜春风来”私人经济获得很大发展，10 年来共上交税金 300 多亿元 安置人员共 2300 多万人 国家基本没有花费投资 而从 1981—1987 年在国营企业新就业的人数 1800 多万人，为此新增加固定资产投资 1300 多亿元)。由于个体户多从事的是小型商业、服务业、饮食业和修理业等国营经济不易辐射到的领域，从而大大缓解了生活中的诸多不便，目前中国城市居民每购买的 100 元商品中 就有 20 元商品来自个体户。从中国目前的生产力水平看，适当地发展私人经济是有益于国计民生的。

“私人经济的消极作用应当限制”

无庸讳言，以追求利润为目的的私人经济也有其消极的一面。王忠明说，目前的个体、私营企业主要存在两方面的问题。

一是非法经营。少数个体工商户、私营企业主勾结“官倒”倒卖生产资料和紧俏商品，有的私人企业销售、制造假冒商品，或者偷工减料，损害消费者利益。还有的地方出现了一些新“把头”欺行霸市，抱买抱卖，哄抬物价；也有一些个体户和私营企业卷入了前一阶段印制、贩卖淫秽出版物的“黄流”，在广东、海南等沿海地区，还有一些从事餐饮旅店业的私人企业主利用赌博、卖淫非法牟利；也有人参与走私贩私。但从目前掌握的情况看，经济犯罪的大案要案中牵涉到私人企业的还不多。

二是偷税漏税。有部分个体户、私营企业偷税漏税严重，特别是一些无照经营者，利用管理上的漏洞，不交纳税款。据调查，上海私人企业偷、漏税大案涉及的22户中，只有几户有营业执照。

对社会中分配不公，个体户、私营企业主收入高的问题，王忠明谈到，确有少数个体、私营户收入过高，但这部分人数并不多。据调查，目前年纯收入1万元以上的个体工商户、私营企业主占总数的4%~5%。在北京这样的大城市里，个体工商户平均年收入也只有七千元左右，从表面上看远高于国营、集体企事业单位职工平均年收入（后者约为2000元左右），但公有制经济的从业人员在劳动保护、公费医疗、住房等社会福利方面还享有2000元左右的实际收入。相比之下，个体私营户劳动时间长（据调查个体工商户平均劳动时间每日达13小时），走街串巷，工作条件差，有经营风险（每年都有10%左右的个体户倒闭）。有的还要拿出高于税收1-2倍的收入来应付各种摊派。当然更为重要的是他们还要拿出钱来用于积累、扩大再生产。

“不搞‘私有化’，同发展私人经济不矛盾”

王忠明透露，今年以来，由于遇到资金紧张，原材料、燃料价格猛涨，“摊派”增多等原因，个体、私营企业减少较多。也有些“老板”害怕政策会变，吹灯拔蜡，另找出路。甚至还有的地方没有正确理解反对“私有化”的精神，提出停止和限制发展私人企业。

王忠明向笔者解释：所谓“私有化”理论是指前一段有人散布取消公有制经济，将国家和集体财产私有化，在中国走资本主义路，这是行不通的。

“然而，”王忠明说，“在坚持公有制的前提下，中国将不会改变在一定范围内和一定程度发展私人经济的政策。这个政策是改革的产物，是十三大

的既定方针，已载入修正后的宪法。在日前的国庆活动中，中央领导人还特别谈到：现行的个体经济私营经济政策绝不会轻易地加以改变；在社会主义初级阶段，个体经济和私营经济是公有制经济的补充，应当允许它们存在和发展，但要依法监督和管理，保证它们的健康发展。所以，借口允许适度发展私人经济而鼓吹私有化，是错误的；借口反对私有化否定私人经济也是不对的。不搞私有化同适度发展私人经济并不矛盾。”

王忠明告诉笔者 私人经济 1988 年产值为 516 亿元 只占全国工业总产值的 2% 多。这个事实表明，继续允许私人经济的存在和适度发展，不会改变以公有制为主体的社会主义性质。他请各位关心中国私人经济的海内外朋友放心，随着经济环境的好转和人们对党的私人经济政策理解的深化，个体工商户和私营企业将会渡过目前的困难，在国家经济生活中发挥更大的作用。

1989 年 10 月 20 日

厂长收入十万 书记奖金千二 ——首家租赁企业分配悬殊引起社会议论

□ 本报记者 陈红雨

中国第一家租赁企业——沈阳汽车汽油泵厂，5 年租赁期间，租赁厂长凌方道按租赁合同规定拿到近 10 万元的收入，而该厂党支部书记董素珍 5 年得奖金 1220 元。两者的收入悬殊引起社会议论，被称之为“董素珍现象”。

48 岁的董素珍，1984 年任沈阳汽车汽油泵厂党支部书记。当时的租赁厂长凌方道承包后，在企业内实行一系列改革，一年就扭亏为盈。在前后两期计 5 年的租赁期中，以超过计划利润指标数倍的成绩完成其使命。今年元月他卸任时，按租赁合同得到近 10 万元。董素珍在此期间，除去年按公司新规定拿到 280 元奖金外，以前每月得奖最低时只有 7 元钱。

据辽宁《党员特刊》报道，在凌方道租赁经营期间，每当工人或厂长思想产生波动，董素珍无不以大局为重，耐心做好思想政治工作。当凌方道因方法不当，在处理工人并与之严重冲突时，董素珍分别找厂长和工人谈心，既维护了厂长的权威，又指出了厂长的不足。特别是在凌方道第一年个人获

得 2.7 万元，工人们对此产生强烈的抵触情绪时，董素珍更是以普通工人待遇的身份出面，向工人介绍企业租赁后发生的巨大变化，使工人看到厂长所付出的劳动、承租的风险与压力，从而较好地缓和了矛盾。

“董素珍现象”在沈阳产生强烈的反应，引起人们深思：在租赁、承包企业中，如何解决收入分配悬殊的矛盾？

有的认为凌方道收入完全合理；有的认为凌方道收入合法不合理；有的认为董素珍的低收入实际上反映的是降低了党务干部在企业中的地位；有的认为是由租赁和承包带来的问题；有的则认为凌方道收入太高，与其付出的劳动相比太不合理……

那么，“漩涡”中心的凌方道是怎么想的呢？

二

47 岁的凌方道今年元月卸任后，现任沈阳汽车汽油泵厂的上级单位——金杯汽车股份有限公司体改办副主任。近日，他接受了记者的采访。



同是下海人

“1984 年以前，该厂是处于微利的状态，当时公司领导曾批评我，说是打不开局面的领导，准备撤换我。我不承认自己连 150 多人的小厂也治理不好，于是在租赁时一气之下就投了标……”

在 3 年租赁期内，凌方道使工厂的利润连续翻番，1984 年实现利润 18.2 万元，1985 年实现利润 40.5 万元，比 1983 年租赁前的利润 4.6 万元增加了近 8 倍。1986 年实现利润 27 万元。

在谈到“董素珍现象”报道和讨论时，凌方道认为：第一，讨论目的不明确，不能以党支部书记的收入多少来评价其在企业中的地位。第二，不能拿现在的眼光来看过去的事情，我的大部分收入是在 1986 年以前，1987 年我

只收入 1550 元（注：租赁后凌即不拿任何奖金和工资）董素珍在这一年内工资加奖金也与我收入差不多，而我承担着风险、压力。第三，在租赁期间，我一直支持和关心董素珍同志的工作和生活。如董素珍丈夫去世时，我忙了几天，帮助她料理后事，协助她解决了住房和孩子就业等问题，并带头捐献了 300 元钱赞助她。

“事实上，我对钱是不在乎的。”凌方道介绍“1985 年初，按合同规定我该拿 2.7 万元时，我却非常苦恼，不知如何处理。原沈阳市委书记李长春（现辽宁省省长）说：这笔钱该拿，因为它合理合法，但作为共产党员应处理妥当。所以，我一方面复印一个存折放在办公桌的玻璃板下，供还在观望租赁（或承包）的人们参观，另一方面偷偷取出 1 万余元，为本厂每个职工买了一块布料，为此，我还受到了上级的批评。”

凌方道提供了 10 万元去向清单：

1. 先付给两位担保人风险补偿费 13800 元。
2. 1985 年，为工厂职工购买纯毛华达呢，共计 10600 元。
3. 用于职工旅游费计 4000 元。
4. 用于每年职工会餐 7000 元。
5. 向省儿童福利基金会和省民政厅捐款 3000 元。
6. 用于工厂一些不能算入成本的费用（如招待费）4000 元。
7. 对厂有特殊困难的职工资助约 8000 元。
8. 历年送给有业务联系的单位及“三·八”节为厂内女职工买小礼品共计 5000 元。
9. 购买 20000 元公司股票和 5000 元国库券。

凌方道说：“租赁是上级让我干的，收入是上级让我拿的，今天把我作为分配不公的典型，我非常想不通。”

记者的话：现在压倒一切的是稳定，稳定经济的中心，是稳定企业。租赁和承包是改革中的新事物，功不可没，但在收入分配上确有过于悬殊之事，这应该通过逐步完善租赁、承包办法加以解决。

1989 年 12 月 1 日

陈红雨小传

原中华工商时报驻辽宁记者站站长，现在四川工作。

划清思想界限 稳定私营政策

□ 本报评论员 尹克

近年来，在一些地区私营企业的发展呈下滑趋势，私营企业户数急剧减少。据部分地区的统计，今年以来私营企业户数减幅在 15%~50%。

本报今天刊登长篇报道《写在今天的思考》意在反映这一现实，分析原因寻找答案。

从报道中不难看出，私营企业发展下滑原因是多方面的。经济环境紧缩因素有之；市场疲软影响因素有之；税负增加过多因素有之；私营企业素质不高因素亦有之。但是，同样不难看出的是，在诸多因素中，一个主要因素是一些地区的领导和有关部门对中央治理整顿措施理解上存在片面性。如有的县先捕人后取证搞“查大户”；有的地方先定数额后派人进点追索“补罚偷漏税款”；更有的地方指令停业一批，赶跑一批，罚垮一批；有的地区对私营企业提出“赎买”；引导走社会主义”。这些做法成为私营企业急剧萎缩的一个重要原因。

我国目前处于社会主义初级阶段，对于个体私营经济，中央一贯方针是：在公有制为主体的前提下，鼓励引导发展，保障合法权益，加强监督管理。我国宪法规定：“国家保护私营经济的合法权利和利益。”欲使私营企业重新走上健康发展之路，必须坚持党的方针、政策，在思想上划清几个界限：

其一，把握党鼓励私营经济政策同“私有化”的界限。改革开放以来产生的私营企业是党的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理论和方针政策的产物，是对公有制经济的必要、有益的补充，我国私营企业的产值在整个国民经济中还不到 1%，它不会威胁公有制主体的社会主义经济基础，更不可能动摇社会主义上层建筑，不应当把私营企业看成异己力量。

其二，掌握对私营企业性质的认识与当前具体实施政策的界限。我国目前存在的私营经济有别于资本主义经济，不应当把私营经济中一定程度的剥削与阶级剥削划等号。私营企业主首先是从事经营、管理的劳动者，其次才是部分剩余劳动的占有者。他们的经营是宪法允许的，他们的权益就应受法律的保护。

其三，掌握正当经营和违法暴富的界限，不能因为一部分私营企业主富裕起来，就认为出现了政策性失误，而对允许和鼓励这部分人靠诚实劳动和合法经营先富起来的重要经济政策产生怀疑或予以否定。

沈阳皇姑屯区及全国不少地区的经验告诉我们，界限划清了，政策就可以稳定“，政治上不歧视 政策上促发展 利益上给保证 管理上要加强”就不会只是墙上贴的、嘴巴中喊的口号，而是成为一条条具体的鼓励、引导私营企业发展的好政策。个体私营企业的稳定健康发展并非小事，它将有利于发展生产 增加财政收入 扩大社会就业 方便人民生活 有利稳定。同时它向海内外各界人士印证，中国的改革开放的方针确实没有变，增强港澳台侨胞和国外工商界同我们进行经济合作的信心。

1990年8月15日

著名经济学家薛暮桥说：我们与资本主义国家既竞争又合作

不采取世界公认的办法不行

本报讯（记者 立勤）日前，著名经济学家薛暮桥对中国改革的方向问题再次直陈己见：“我们前进的正确方向应当是理顺价格、平整市场 使各企业能够在同一个起跑线上公平竞争 使竞争的办法规范化。”他说 像刚闭幕的亚运会一样，我没听说有人批评这样的竞争规则是资本主义还是社会主义。薛老强调：我们要同资本主义国家既竞争又合作，不采取世界公认的办法是不行的。

这番话 是薛暮桥在 10月 10日北京举行的“社会主义经济改革理论讨论会”上讲的。

薛暮桥在发言中回顾中国十年改革历程时说，十一届三中全会以后，我们把束缚生产力发展的僵化的产品经济管理制度，逐步改变为商品经济的管理制度，这是一个巨大的思想上的突破。

实践证明，它对我国生产力的推进起了巨大作用。他强调，当时如果没有邓小平同志等老一辈无产阶级革命家所提出的实事求是、一切制度从有利于生产力发展出发的思想转变，从而始终坚持改革开放的基本国策，这种变化也是不可能取得的。

薛暮桥批评说，有些经济学家受旧观念束缚，仍然认为社会主义国家只能“自觉运用价值规律 实行计划价格 这实际上是抛弃价值规律 必然导致价格背离价值”。

他提醒人们：“由这样的价格来调节生产 必然会引起不合理的产品结构和产业结构。这不是深化改革 而是使改革走回头路。这是万万要不得的。”

薛暮桥告诫人们，不应把放开价格的危险性估计过高。

他说 我们绝大多数消费品价格已经放开 从而使市场商品种类繁多 琳琅满目。重要的生产资料有相当大一部分还是按照计划价格进行计划分配，但这些产品也有相当大一部分实行议购议销。取消两种价格的办法是压缩基建 使生产资料需求不超过它的供给 从而使两种价格向一种价格靠拢。

薛暮桥指出，经过两年的治理整顿，建设规模得到控制，据说今年煤炭、钢材等供应大大缓和 有时甚至供过于求 议购议销价格下降。

薛老估计，放开价格，计划内生产建设成本固然会提高，计划外生产建设成本将会降低，物价总指数是不会上升的。因此，对生产资料价格的调整 不要顾虑过多。

最后，薛暮桥再次向此间人士重申自己的一贯主张：由于理顺不合理的价格体系，是整个经济体制改革成败的关键，也是今后深化改革的关键，因此，只有理顺价格，才能使企业有正确的经济核算，能够自主经营、自负盈亏、公平竞争、优胜劣汰 才能把企业真正搞活。

1990年10月17日

吕立勤小传

原中华工商时报编委 新闻评论部主任 现供职《经济日报》。

通过产权买卖挤进国际市场

海外华人企业家建议大陆企业重视资产经营

本报讯（记者 吕平波）中国企业要想打入国际市场，真正参与国际竞争并成为国际上的一流企业，就必须把产品经营与资产经营结合起来。这是海外华人企业提出的建议。

首次“华资企业经营战略与管理经验研讨会”的组织者、中国企业管理协会研究部主任陈重解释上述观点时称：就前者而言，我们可以利用国内资源，廉价劳力、厂房、水电 引进国际先进技术和设备 生产高档出口产品 去占领高消费的国际市场 就后者而言 就是要将存量资产变成能生钱的活资产。

他举例说 日本每 1000亿美元的海外投资，实业投资为 400亿 而股票

资产等金融投资则占 600 亿 实践证明 这种做法是成功的。

富有海外投资经验的华人企业家建议大陆发挥社会主义的优势，通过企业的产权买卖参与国际市场。他们认为，社会主义制度的优点是和能力把有限的人力、物力集中在一起参加建设。因此用“集中”的社会主义去吃“分散”的资本主义是可行的。

目前中国工业技术水平不够高，大宗出口产品容易被其他国家和地区取代 而产权的“卖出”和“买进”是强化竞争能力的有效途径。

所谓“卖出”就是把国家允许外资收购或参股的企业产权，通过招标、拍卖的形式部分或全部地卖给外国企业。外国企业为了尽快收回投资，就会把先进的技术设备和管理方法带进来，并利用它在国际上的销售网络，把产品销往高消费的国际市场。卖出产权的资金所得，可用做“买进”外国企业产权的所需资金。

所谓“买进”就是收购兼并外国企业产权 通过买进外国公司 买进其生产技术或销售网络 从而使国内企业的产品得到技术改造或利用其销售网络。

实行“买进”战略最关键的是可以融资。目前国际上流行“杠杆收购原理”即基本利用银行资金。有人提出 由于大陆企业的国营性质 其强大的背景本身就能成为实力的一部分。

提出这项建议的华人企业家同时认为，股份制是中国企业走向国际市场的必然选择。

有关资料表明 中国企业有 2/3 处于明亏和暗亏状态。 1.6 兆亿的国有资产和企业的存量资产不能发挥应有的作用，而从经济发展的角度看，企业不但要经营产品，还要经营资产。

有关人士分析，国有资产产权出让 1/4 就达 4000 万个亿 如果算上资产评估升值的话达 6000 至 8000 万个亿 套回外汇现金一半可用于交通、能源、通信，一半可拿来改造大中型企业。否则，像鞍钢这样大型企业完全靠贷款来完成税利，将来是很难翻身的。

海外人士认为，内地的企业利用上海、深圳的股票市场上市股票、上了市的公司到香港的股票市场挂牌买卖，是一条收集资金、引进外资的捷径。经营为存量资产，把不能生钱的存量资本卖出去是最优秀的一种经营方法。

1991 年 7 月 27 日

吕平波小传

水皮者，吕君平波也。甲辰年生人，壬戌年，苏州之高考状元，修习新闻七年久，一枝秃笔写春秋 己巳年随报人丁望创办中华工商时报 后开办财经评论专栏。拆“波”字为“水皮”，于是世人皆晓水皮，而不知吕君。其文如匕首，如投枪，直若股市鲁迅。

吴敬琏主张推进市场取向改革

市场化不能等同于私有化

本报讯（记者 王从军）国家科委科技促进发展研究中心日前在京举办了“现代企业高级主管国际研修班”著名经济学家吴敬琏在演讲中特别强调要大力推进市场取向的改革，使有计划商品经济，即有管理的市场经济体制较快地建立起来，以此使国家经济克服困难，并在 90 年代中期实现腾飞。

他说 所谓推进市场取向的改革 还是 1985 年党的全国代表会议就讲了三个方面：一是把国有企业变成自主经营、自负盈亏的独立的商品生产者；二是建立竞争性的市场体系（包括商品市场、要素市场、资金、劳动、外汇等等）经营人员也要进入市场；三是改变宏观微观大一统、什么都由国家控制的局面，建立以通过市场中介的间接调控为主，也就是以十三大提出的“国家调控市场、市场引导企业”的办法为主的宏观调节体系。

吴敬琏认为，一年多的“治理环境”造成了较为宽松（或“疲软”）的环境，加之十年改革，市场要素已在全国各地、各经济领域不同程度的增长，理论问题得到进一步阐明，为解决深层次问题指明了方向。

所以，推进市场的改革已具备了条件。人们认识到，计划和市场是配置资源的方式和手段，而不是区分社会主义和资本主义的标准。资本主义有计划、社会主义有市场，不搞市场是自甘落后。

吴敬琏说 我国经济的深层问题之所在是结构不好、效率不高，进一步说是体制问题，对此大家都有共识。但再进一步问，为什么体制失灵，如何解决呢？看法就截然对立了。一种认为应加强国家计划，停止搞市场取向；另一种认为改革中的失误不是来自市场取向，正相反，是因为破了旧的未立起新的来，才出了问题。吴敬琏本人持此种观点。他说，在经济中同市场联系愈是密切的部分，经济改组得快，活力很强，相反，市场化进程落后的国营大中型企业陷于困难就是证明。改革中的某些缺点和错误并不在于市场搞多了，而是在 1987 年后国家部门的“市场取向改革”基本停顿了，没有实质性的进展。

这位学者指出，一方面，改革必须深化，别无选择，只要能改就要尽量改；另一方面，到目前为止，时机还未完全丧失，如果审时度势决定改革的范围和步骤，又采取必要的防范和缓冲措施，迈出一定的步子，问题是不大的。

有一种观点认为：现在主张加大市场取向改革分量的人，其实心里想的

是全盘私有化，只不过不敢明说罢了。对此，吴敬琏强调，不能保证主张市场取向改革的人们中没有同时主张私有化的，因为如果认为市场经济是同公有制不相容的，就会把市场化同私有化混为一谈，实际上它们并不是一回事。在他看来，以市场配置为基础的资源配置方式，是迄今为止惟一能够在社会化经济中有效率地配置资源的方式。至于它是建立在私有制的基础上还是建立在公有制的基础上也是另一回事。

市场经济并不是注定了同公有制不能相容的。吴敬琏主张在我国搞一种以公有制法人分散持股为主、个人持股为辅的股份公司，以之作为社会主义商品经济的微观基础。如果坚持认为国营企业只能由国家直接经营，才真正会损害公有制经济，使资本主义取胜。

1991年11月16日

王从军小传

原中华工商时报记者 现在《中国质量报》。

称“市场经济”何妨

□文夫

随着小平同志南巡讲话精神的深入传播，一个近乎“古老”的话题再度成为“热门”。这就是如何判断社会主义的经济性质。

经济界尤其理论界的许多人大胆地抛弃了原有的说法，提出社会主义经济是有计划的市场经济，或者说政府指导下的市场经济，还有人提出社会主义经济是公有制为主的商品经济等。人们普遍感到一阵清风扑面而来。

长期以来，我们的确在探索中不断深化对社会主义经济性质的认识。开始，人们以为社会主义经济就是计划经济；后来有人提出发展商品生产和商品交换，以及计划经济为主、市场调节为辅的观点；党的十二届三中全会把社会主义经济确定为公有制基础上有计划的商品经济；4年后又有人提出了计划经济与市场调节的说法。认识上的变化，使我们走过了一段漫长而又曲折的道路。

虽然我们迄今仍在认识真理的道路上继续探索，但我们通过实践的代

价终于正在缩短认识上的距离。按照实践第一的原则 我以为 只有“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提法，才能更准确地反映我国的实情。

从理论上讲，商品经济实质是市场经济。因为商品本来就是为市场而生产并在市场上交换的产品。既然承认商品经济，何不直接称其为市场经济呢？

计划只是调节经济的手段，并不表明社会经济的性质。资本主义与社会主义的区别，不在于是计划经济还是市场经济，因为资本主义也有计划，社会主义也有市场。市场并不为资本主义所独有，它存在于一切有商品生产和交换的社会。

再从实践上看 我们 13 年来的改革，实质是市场取向的改革，经济体制的每一项改革几乎都与扩大市场调节的范围有关。改革后的固定资产投资由国家安排的部分仅占 1/5 左右，工业生产指令性计划比重已缩小到 16%，国家定价的比重也不足 1/3。在这样的形势下，国有企业正更加自觉地走向市场，一个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市场体系亦正在开始形成。在江苏及华南各地，指令性计划不断缩小，价值规律作用进一步增强，市场已主导其经济运行，以市场导向为主的经济运行机制亦正在逐步建立。

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区别于资本主义经济的重要标志，是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始终坚持以公有制为主体的生产资料所有制结构，和以按劳分配为主的分配方式。无论从何种角度看 我们 13 年来的改革不仅没有超越这条原则，而且更加迅速地加快了社会主义经济的发展，城乡人民的生活水平有了较大幅度的提高。正因如此，我们何不大力发展这样的市场经济呢？

如果我们索性改称其为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就可减少无谓的争论，这对于整个社会主义事业的发展想必有利无弊。

1992 年 6 月 20 日

何为市场经济新体制

陈锦华描绘主要环节

本报讯（记者 杨晓平）国家体改委主任陈锦华在全国体改工作会上描绘了建立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新体制的几个主要环节。

陈锦华说 在社会主义条件下搞市场经济 难度很大。要保证改革的健康发展 需要我们在科学总结国际国内实践经验的基础上 不断加深对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基本特征与要求的认识 正确地把握建立新体制的主要环节。

这位主任从几个方面具体描绘了建立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

他说：“第一 建立以公有制经济为主体，个体、私营和外资经济为补充，多种经济成份长期并存、共同发展、平等竞争的所有制结构 第二 建立以政企分开、资产所有权与经营权分离为基础，企业作为独立的经济法人，自主经营、自负盈亏、自我发展、自我约束的现代企业制度 第三 建立统一开放、平等竞争、规则健全、运转有序的市场体系和价格形成机制 第四 建立以实现宏观经济总量平衡和整体结构优化为主要任务，以经济政策和经济杠杆为主要调控手段的宏观间接管理体系；建立符合社会主义市场经济规律的结构合理、职责明确、精干高效的经济管理机构 第五 建立企业和职工实行双向选择的竞争性开放性的劳动就业制度，以按劳分配为主体，多种分配方式并存的收入分配制度 以及健全统一的社会保障制度 第六 建立严谨、科学、统一和完备的经济法规体系和经济监督体系。”

1993年1月18日

杨晓平小传

中华工商时报首席记者。感谢报社给我提供了很多采访机会从而也抓着机会、财富访谈，年年参加两会报道 能撞上一些比较有一定影响的独家报道 凭着热情、激情没有浪费这些机会。

国务院领导认为“翻牌”公司是倒退

权力不能进入市场

本报讯（记者 张凤山）国务院领导日前对“翻牌”公司提出严厉批评 称这种作法“不是改革 而是倒退”。

国务院领导在对一篇文章的批示中说，在机构改革、转变政府职能的过程中，成立一些公司是需要的，但把属于企业的正当权益收上来，甚至取消企业的法人资格，重新使企业成为行政附属物和摊派的对象，这不是改革，而是倒退。这样做，不仅不利于市场主体的形成，而且会强化行业垄断，窒息市场活力，显然，与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建立是背道而驰的。因此应当明

确，各级政府机关在机构改革中成立的公司，或者由富余人员组成的公司，都必须立即和原机关脱钩，实行真正的政企分离，在经济上独立核算（开办初期需要财政补助的也应单独立账，除极个别特殊情况并经国家批准外，这些公司不得兼有行政职能）；成立企业集团也必须坚持企业自愿参加。这应当作为一条重要的原则确定下来。

国务院经贸办日前发出通知，要求各地认真学习国务院领导的批示精神，对本地区、本部门存在的类似情况进行检查和纠正，真正把贯彻《条例》，转换企业经营机制的工作做好。

经贸办副主任陈清泰就贯彻批示精神对记者说，我们并不是反对成立公司，而是反对那些政企不分的公司，公司就是要“下海”，搞市场经济，也不是一般地反对建立集团，而是反对那些靠行政性权力捏合起来的集团。

他认为，政府部门机构改革，转变职能，是建立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需要；同样，从原有部门分离出一部分人建立公司，也要服从于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需要。新设立的公司，决不能走回头路。

他强调，政府部门办公司不是为了搞部门利益。政府部门绝不允许有其职责之外的独立利益。如果有了这方面的利益，就会出现以权谋私。权力一旦进入市场，就没有公平竞争可言。

据了解，截至去年年底，全国已登记的法人公司达 48.6 万多个，其中去年一年就新注册 226000 多，占了近一半。为了避免翻牌公司混迹其中，有关部门将对公司、集团进行一次清理。

1993 年 3 月 3 日

张凤山小传

曾任中华工商时报新闻部主任、副总编，现任《中国质量报》社社长。

国有资产授权经营启程

“重汽”和“东风”集团试点方案已获批复，
其余六家可望下月初批复完毕

本报讯（记者 吕平波）中国企业集团的规范化操作迈出了历史性的